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大概是2009年,我还在复旦读研究生,弟弟即将从北

是姚关人啊。我们欣喜得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施甸是大毕业。弟弟到上海来找我,我们去了崇明岛,那也是我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去崇明岛。从码头乘船过去,刚到码头,只见江水茫茫,浊浪滔滔,世界灰蒙而又开阔。耀眼的阳光下,一艘艘大船泊在岸边,不时随了波浪微微浮动,一声声滞重的汽笛不时传来。

聊了些什么,具体的想不起来了。但我记住了,他和儿子在崇明一所造船厂工作,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市区做服装店的销售员。他还说,他们住的房子是每月五百块租来的,可以自己做饭。我那时候还没自己租房住,还不懂得做一个租客的艰辛,但已经隐约知道,五百块在上海能租到怎样的房子。这房子,要住他们四个人,他们彼此之间还隔着一道大江。自那以后,我再没去过他。

但他的消息是时不时传来的。他似乎不会发短信,总是打电话给我,告诉我他加工资了,他儿子要娶媳妇了,告诉我他妻子身体不大好要去医院了,他怀疑女儿谈恋爱了。有时还会告诉我,他攒了多少钱……我听着一无用的议论。

一天傍晚,我独自走在路上,经过一家房产中介的门店,驻足看橱窗里的广告,房子从几百万到几千万,房租从一两千到一两万。手机响了,再一看是他。他的声音里透出从未有过的兴奋。我说,阿叔你喝酒了?他说,喝酒了!你什么时候来崇明找我玩儿啊,我请你喝崇明老白酒。我说好啊,我好久没到崇明了。他说,你猜,我攒了多少钱了?我说多少?他说,二十万了!我说那是得好好喝点儿酒。他又说,你什么时候回施甸?去姚关,我请你喝酒!然后,告诉我,他家就在施姚公路的某个拐弯处。我家特别好找,他补充说。

站在上海夕阳下的街头,我想象了一下,几千里外故乡那些莽莽苍苍的大山。

春日上午,阳光明媚。坐在窗前的施蛰存先生品味着一杯咖啡,他说:诗,应如它一般醇香而耐尝!确实,先生对什么是诗要求甚高:认为诗魂应在它浓郁的感情抒发之中!谈到新诗产生,他说:本人并未感到胡适的《尝试集》就是“新诗”,且味道也淡了一些,说:当然,胡适主张诗应该有新形式是对的。但真正的创新,搞出新形式却是不那么容易的。后来,诗坛上《女神》面世了!他在报上看到

了试验班,主要负责电缆周期性试验和故障抢修工作。当然,工作性质使然,深夜抢修,爬隧道,下工井这样的脏活累活儿也算家常便饭,但师傅们都是最朴实,最可爱的,他们用自己这么多年积累了的经验告诉我该从哪做起、该怎么去做,只要用心学,用心记,我每天都在成长,都在进步,这让我在第一时间找到了存在感和满足感,每天都过得很充实。

2012年,班组引进了一套新设备,现场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寻找电源上,效率很低。回到班里以后,我查了设备的相关参数,琢磨着能不能想个办法,让设备可以一到现场就能用。果不其然,一个小小的改进就让现场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,我因此受到了班长和同事们的称赞,心里也是美滋滋的。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,这个“小改进”就像是一颗创新的种子悄悄地进入了我们的班组里发芽了。小伙伴们把现场遇到的问题及时带回来,一起商量,一起研究解决办法。

就这样,活儿越干越顺,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在多个群众性创新大赛上获奖。

正当我无比感恩于这些收获的时候,更大的“幸福”却在不经意间悄悄地来临……2015年,国家电网公司举办了首届青年创新创意大赛,正巧此时,我们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已经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现场作业方案,于是我带领着项目《高压电缆局放带电检测系统的移动化作业方案》一路过关斩将,最终从全国35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站上了青创赛的最高领奖台,我个人也因此被授予了国网“五四青年奖章”的荣誉称号。

幸福在城市地下延续

顾黄晶

一路走来,我意外地失去了我的视力,但我依旧生活得充实。

责编:刘芳



恋 (中国画) 罗青(台湾)

小时候喜欢披头士,也知道约翰·列侬的妻子 Yoko Ono 是一位日本当代艺术家,但那时的中文媒体多将其译作“大野洋子”。到了二十世纪末,不少媒体逐渐意识到此属误译,遂修正为“小野洋子”。于是,当我逐渐长大,洋子小姐却逆生长了——从“大野”变成了“小野”。

虽说在日文里“大野”与“小野”都读作“Ono”,且小野洋子在海外发行作品时也多用 Ono 之洋名,但译者若能更细致地查阅文献——毕竟1960年的日本展览海报或画册上都赫然写着“小野洋子”——那么大小野之误也是可以避免的。

韩国电影导演 Hong Sang-Soo 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:洪导最初为中国影迷所知时,一般被译作“洪尚秀”;但韩国电影资料库(KMDB)上的官方译名却写着“洪常秀”,据说洪导自己签中文名时也写作“洪常秀”。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的“洪尚秀”已太过深入地刻进意识内层,也可能是因为“洪常秀”的发音会让人联想起“红肠秀”或者“红长袖”——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影迷仍然没能纠正过来。

说到西人姓名的翻译,一般同样遵循音译的原则:Mr. White 不会译作白先生,而是怀特先生,切尔西队的中场大将 Drinkwater(德林克沃特)也只在昵称时

被叫作“喝水哥”;而专业记者或职业译者一般会按照新华社译名资料组编写的《译名手册》的规范统一翻译人名。

但另一方面,错误的人名翻译因为传播时间过久、范围太广以致难以修正的情形也是有的:英国艺术评论家及小说家、《观看之道》的作者 John Berger 便是一例。Berger 不但按读音近“伯杰”,而且在新华社的译名手册上也是如此;但自从无从查考的那第一位译者将其误译为“伯格”之后,John Berger 在中国一直被称作“约翰·伯格”。如今 John Berger 的著作已大量翻译出版,此时再修改作者人名的翻译,势必会引起混淆——看来只能习非成是,“伯格”到底了。

幸好,新华社的《译名手册》上还有一条有趣的说明,“凡在我国已有通用惯译的姓名或其本人具有自选汉字姓名者,按约定俗成原则处理”。或许“伯格”据此便可归入惯译。至于自选汉字姓名者的例子,远有白求恩(Bethune 怎么看都很陌生吧),近有《寻路中国》的作者何伟(常常想不起他就是 Peter Hessler),而最诡异的当属法国哲学家、《景观社会》的作者居伊·德波(Guy Debord)了,他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“鬼得破”堪称音义兼备,只是出版社怕名著被误归入悬疑小说类终究没有使用吧。

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催生诗情迸发的,每到松江余山,总觉得难以把持自我。触景生情,诗意走心。

我喜欢在烟雨朦胧中看余山双峰,山若情侣,比肩而立。青翠欲滴的东西余山,含情脉脉,不离不弃。想到这一层,初夏的山风和摇曳的余山修篁,也有着赧可叹。这种感觉很美妙,神奇地抽长爱恋诗草。

余山诗意,不仅浓淡咸宜,而且高远飘逸,大有诗在远方的意涵。在沪地诸山中,余山堪称上海“祖山”。先民仰山而拜,崧泽、良渚、广富林等古文化遗址众星拱月般分布在余山周边。先民及其子孙后代思接苍穹,仰拜余山,并非山与天齐,高耸入云,而是余山得天独厚,龙脉绵延,在云端挥写“天书”般的诗行。

山上古有“余将军庙”,庙承天意,山以余姓,相率东夷部族风云往事。西余山东坡上的那座北宋“秀道者塔”,又让人记住了一位名“秀”的秀道者,塔成圆梦。观测天象,余山上有天文台;登“苦路”而至西余山之巅,又见天主教堂的尖顶,在与苍天对话。

人往高处走,我往余山行。余山的草木,让人怀想起明代开《红楼梦·葬花词》先声的松江曲派名彦施绍莘,隐于西余山;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、书画家陈继儒,筑东余山居。东西余山,交臂相望,共同谱写古贤诗意共鸣的交响乐章。为陈继儒祝寿,江南才女柳如是带来了诗,后来,她入松江几社,人在西湖行,尺牍署名“云间柳如是”;大旅行家徐弘祖为请陈继儒给母亲撰写寿文,慕名而至东余山,陈继儒为之取别号“霞客”。

尤记陈继儒著作《小窗幽记》,他相伴余山茶园,在绿香满路、人在草木中勾画出了“一手壶”图样,交由时大彬的高徒带回宜兴烧制。小壶造型取自余山意象,圆润玲珑,一手可托,把玩起来颇有诗意,在改变中国大壶一统天下、茶具由大壶变小壶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不朽的传奇。

我往余山去,我感受着欢乐谷彰显的现代诗情律动,更为一个建在废弃采石深坑里的“深坑”酒店深感惊叹,那是在最接地气的深处,咏唱一首“上海之根”托举中国梦的诗歌。

余山诗意

尹军

夜光杯

叶孝忠(新加坡)

我,一名普普通通的电力一线女工人,2007年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便来到了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,从事电缆运维检修。这个近乎是“男人专利”的工作。也就是这样,我和电缆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最开始冒冒失失,到现如今带领一个国内领先的专业团队,在这10年间,我有成长、有奋斗、有辛酸、有坚持,更有幸福……

记得做实习生时,一开始连电缆都没见过,每天跟着师傅们学习应力锥制作、搪铅等接头工艺,晚上翻阅各类专业书籍,虽有些力不从心,但还是尽全力去适应着这个新的环境。然而,在不久后的中级工考核中,我被要求补实操项目,当时心里真的难受极了,但也许是越挫越勇吧,既然进了电缆的门,男生能完成的事情,我相信女生一样可以!终于,苦练了3个月,我通过了考核。拿到成绩单的那一刻,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幸福的味道……

结束实习期后,我很幸运地被分到

